

當大學生菲傭遇見台灣新富雇主：
跨國語言資本中介的階級畫界過程*

藍佩嘉

<<流轉跨界：跨國的台灣，台灣的跨國>>，王宏仁、郭佩宜編，頁 35-71。
台北：中研院。

一個匈牙利的家務移工，在接受兩位加拿大學者訪談時，這樣描述她的加拿大雇主：「他們覺得你就像你的英文一樣笨！」(England and Stiehl 1997)。英文能力在此具現了第一世界雇主對第三世界女傭在經濟與象徵層面的雙重支配。相反的，我在台北遇到的一位菲律賓家務移工，用很不一樣的方式來描述她的台灣雇主：「他們比我有錢，但我的英文比他們好！」

這兩個說法，反映著分歧的雇傭關係，也突顯出當代世界體系勞動分工的多重層次：當菲律賓與其他亞洲國家的女性移工離開家鄉去異國打工幫傭時，她們的目的地不只是北美與歐洲的後工業社會，也包括亞洲與中東的新興工業化國家(NICs)。這些新興地主國多數沒有長期的被殖民經驗或廣泛的奴隸制，家務移工的普遍僱用是一個近二十年來才明顯可見的現象，她們服務的是隨著工業化而來日益擴張的中產階級家庭。擁有豐沛消費力的亞洲「新富階級」，在一九八零年代蓬勃成長，這恰好是西方社會經歷長期經濟不景氣與成長率衰退的時期(Robison and Goodman 1996)。

台灣與菲律賓在近幾十年間經歷了方向迥異的發展軌跡。台灣八零年代以降成熟的新興中產階級透過買進口車、手機、請女傭，來慶祝他們的向上流動與富足，菲律賓的中產階級卻要逃離經濟蕭條的家鄉、所得過低的職業，到異鄉打工。菲律賓移工在全球勞動力市場中的優勢，部分建立在他們流利的英文能力上，也就是美國殖民者的語言遺產。台灣與菲律賓之間的遷移聯繫，顯示了資本累積跨

* 本文係根據作者於 2003 年出版的英文論文進行譯寫與修改：“They Have More Money But I Speak Better English: Transnational Encounters Between Filipina Domestic Workers and Taiwanese Employers.” *Identities: Global Studies in Culture and Power* 10(2): 132-161。我感謝李慈穎翻譯初稿、鄭玉菁協助校對，以及各位跨國幫友的寶貴意見。

越多重國家領土與文化地景的繁複過程。相較於白人雇主與有色勞工的關係，所謂全球南方(the global south)內部的遷移與雇傭關係，涉及了持續變動、曖昧模糊的階級與族群的區分。

這個跨國相遇的連結構成了一個階級理論的異例：奠基於經濟資本所有權的階級支配不必然符應於文化資本的多寡，在這裡指的是教育文憑以及英文的語言資本。在跨國的脈絡中，階級位置的界定與階級認同的構成更複雜曖昧、具有更多重的決定因素。階級界線不只建立在經濟資源的差異與支配上，也有賴文化正當性的象徵鬥爭，其中，語言的位置特別關鍵。在台灣新富雇主與菲律賓大學生女傭的相遇、互動過程中，雙方都透過英語這個跨國文化資本來進行在地的協商與鬥爭。

在跨國空間中劃階級

我援引 Pierre Bourdieu (1987: 6)，把階級定義為「社會空間上的近似位置」——社會階級是一種分享相似生活機會(life chance)與屬性(disposition)的個體群聚。他認為階級區分不只奠基在經濟資本的分配上(財富、收入、資產)，也同時透過文化資本(教育、禮儀、品味)、社會資本(人際資源、網絡)與象徵資本(正當性)的投資進行再生產。然而，他的定義並非把階級視為社會位置或生活風格而已，階級秀異不只是固定的界線、物質的存在條件，更是象徵鬥爭的競技場——不同的社會群體經由文化資本與象徵資本的投資與配置，來競逐社會區分的正當性(Bourdieu 1984)。

Bourdieu 的階級理論，延續了他整體的理論觀點，強調以社會空間做關係性的思考，也強調階級的再生產是一個社會實作(social practice)。這樣的分析消弭了主觀的階級(意識)與客觀的階級(位置)之間的二元對立，強調階級是在日常互動的過程中做出來的 (doing class) (Hanser 2005)。承繼類似思考理路的有 Michele Lamont (1992, 2000)，比較美國與法國社會在階級秀異區分上的異同。她提出「畫界工作」(boundary work)的概念來強調階級畫分是一個互動性的實作，在界定自我/我群的同時，人們關係性的區分出他者/他群，也衍生並再製了排外與不平等。除了經濟與文化的資本，她也特別強調道德的界線(moral boundaries)，

是階級主體區分異己時經常援引的重要文化資源與論述。¹

Bourdieu 的階級理論已受到若干類似的批評，像是預設有一個客觀存在的社會空間、忽略市場的異質性與文化資本的多樣性 (Hall 1992: 279)，假定資本積累的過程發生在一個「相對同質與靜態的社會系統」(Ong 1999: 89)，較少考慮到個人的流動，並輕忽符號或社會空間其實是開放、變遷、相互滲透的 (Lamont 1992: 183)。近來的移民學者呼籲要跳脫單一民族國家的框架，透過「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的尺度來分析遷移主體的多重位置與認同 (Basch et. al 1994)。Aihwa Ong (1999 : 89)便在這樣的學術脈絡中與 Bourdieu 的理論接枝，把後者的階級理論「跨國化」。她這樣發問：當象徵資本的積累發生在橫越不同文化的跨國空間(其中有不只一種、相互競逐的文化指標可以用來決定象徵價值的高低)，且分布在多重的階級與族群的階層化場景中，這樣的文化積累的效果與策略為何？

Ong 透過研究移居北美的香港移民來回答這個問題。她發現這些富裕的華人處心積慮地將他們的經濟資本轉換為文化資本(如去英國留學、學英文與掌握上流文化品味)，並透過持有多國護照的方式來維持「彈性公民身分」(flexible citizenship)，以利他們在多重國度中取得身分與權利。儘管這些跨國移民者能夠在多重政治版圖與全球貿易中游走，他們在遷入西方國家後，依然受制於公民身分的法律規範以及階層化的種族分類的牽制。這些富裕的華人仍被視為低劣的種族他者，他們「彈性文化積累」(flexible cultural accumulation) 的策略有結構性的限制。

不只是富裕的商業移民，所有的移工/民在遷移經驗中也都參與了跨國空間中階級劃分(transnational class mapping)的過程。當階級形構過程發生在橫越不同文化的跨國空間時，階級與國族的相互締連出現在兩個主要的層次。第一個是結構層次上的階級定位 (class positioning)。全球化不僅打開了資本與勞動力的在地市場，也助長工作與婚姻遷移的現象。在這些生產關係與再生產關係中，國與國之間在政治經濟與文化資源上的不平等，被轉換為遷流主體的資本，也決定了他/她的階級位置的高低。第二個層次是階級變成(class becoming)的過程。國際遷移創造了多重的主體位置，個人得以在這樣的範圍內協商跨越地理國度與社會藩籬

¹畫界工作可能是有意識的或是無意識的，然而，或許因為Lamont的資料來源限於訪問，她所討論的階級畫界似乎多限於個人有意識的言說。本文的資料也有類似的方法論侷限。

的多層階級認同。這樣的階級劃分展現了全球化與在地化的交會力量。雖然階級定位是在全球的層次上運作，然而，「做階級」的互動實作，仍需透過在地的生活空間與文化資源來進行協商與鬥爭。

跨國移民不只行經多重的階級與種族分類架構，他們也穿越了不同的語言場域。語言與階級的關連近來備受學者關注。Bourdieu (1991)的「語言交換經濟學(the economy of linguistic exchanges)」概念，意指每種語言表達都是語言慣習(linguistic habitus) 與語言場域(linguistic field) 的因緣際會(conjuncture)。前者是以特定方式陳述的表達偏好，以及衍生正確文法的言說、符合社會適當用法的語言能力。語言場域則是一個透過特定賞罰與檢查等機制來正當化語言創造與再製的體系。就像其他形式的文化資本，語言資本(linguistic capital)能夠具現化，例如透過教育、教養等過程長期培養持續的屬性(disposition)，也能同時機制化，官方對特定語言的認可或使用即為一例(Bourdieu 1986)。

在後殖民的二十世紀，由於美國的政治與經濟霸權，英文變成了最具支配性的「全球語言」(global language)(Crystal 1997)。在大部分的國際政治、商業與學術會議中，英文變成主要的溝通媒介。透過托福這類全球考試制度以及 TEFL(英文外語能力教學)的教學認證，英文技巧成爲一種客觀資源，對此資源的擁有得以被制度性權威所認定與建立正當性。近來擴張的網際網路也在跨國的虛擬世界裡鞏固了英語的領導地位。

本研究並不著重分析英語之全球霸權的制度化，而是觀察這些在國際語言場域中的邊緣化使用者，包括後殖民的菲律賓移工與台灣的新富雇主，如何透過英語技巧的取得來增加他們的階級利益。能夠說「好英文」的能力，也就是正確的文法與適當的口音，已經變成一種文化特權，並能夠被轉變爲國際勞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與貨幣價值。再者，語言資本的鑑定(例如判斷那種語言較有價值、哪種口音更爲道地)也構成了一個象徵鬥爭的權力場，不論是在制度領域或是日常生活的層面。

要探討跨國家務僱傭關係中的階級畫界與語言鬥爭，這篇文章處理下列問題：台灣雇主與菲籍家務移工如何積累與轉換不同的資本，以增進他們在跨國脈絡下的生活機會(life chances)？英語作爲一個全球尺度下的優勢語言資本，在這個跨國相遇的連帶中，如何變成象徵支配與反抗的工具？台灣新富雇主與菲律賓移工如何透過跨國語言資本的中介，進行階級定位與畫界？

當台灣遇到菲律賓

台灣政府於 1992 年正式開放外籍家庭幫傭與監護工(以下統稱家務移工)的僱用，這個政策主要是基於核心家庭、老年人口的擴張，所衍生出來對於孩童照顧、老人照護、與病人看護的大量需求。台灣家庭雇居家務移工的數字在近十年內快速增加。現有超過 130,000 的登記家務移工在台灣居留，來自菲律賓與印尼的女性移工佔了總人數的 90%。

大部分的台灣雇主沒有雇用本地家務勞工的經驗。他們之中只有很小的比例，父母曾經在他們小時候雇用女傭或保母。奠基於代間向上流動的雇主階層的擴張，也出現在其他亞洲新興國家。Christine Chin (1998)便指出馬來西亞的雇主僱居家務移工，是他們成為新興中產階級的身分標記。在香港和新加坡，雇用外傭已經幾乎成為雙薪中產階級家庭的必要服務，在針對該階層銷售的公寓的藍圖設計中，都可以看到傭人房的必備設計。

菲律賓曾經居於亞洲經濟的領導地位，然而到了 1980 年代初，卻面對經濟衰退、外債高築，以及周期性的政治動盪等種種危機。今日的菲律賓是亞洲最大的勞力輸出國，世界排名僅次於墨西哥。菲律賓移工的主要目的地已逐漸從北美與歐洲，轉換到中東與東亞。家務幫傭、清潔工與其他服務性的職業，為過半數的菲律賓女性移工從事的勞動工作。

菲律賓移工為世人所知的，是他們的高等教育與英語能力，兩者都是美國殖民的遺產。美國在菲律賓普設大學。與其他經濟發展程度相仿的國家相比，大學教育人口佔菲律賓總人口的比例非常高²。1901 年，在美國從西班牙手中取得菲律賓統治權的三年後，英語在被宣佈為所有菲律賓公立學校的使用語言。這項政策基於殖民主義的以下信念：「掌握英語的知識是領受美國生活方式的必要基礎」(Bresnahan 1979: 65)。直到今天，英語依然支配了菲律賓的官方文件與課程教材

² 2000 年，菲律賓人大學/專的在學比例(the gross enrollment rate)超過 31%(相對於就學年齡的該層人口中)，比印尼的 14.6%高出許多。聯合國文教處

http://www.unesco.org/education/efa_report/zoom_regions_pdf/easiapac.pdf，2004 年 12 月 3 日。

³。教育程度較高的菲律賓人在日常對話裡使用混雜的 Tag-lish(他加祿語跟英語的混和體)。本地語言被視同為非精英與非現代化的語言，而英語依舊是專業與高等教育階層的偏好(Sibayan 1991)。

殖民者所留下的文化及語言遺產，弔詭地成為菲律賓人在後殖民時代逃脫蕭條經濟的寶貴人力資本，讓他們在全球勞力市場上，比其他國家的移工具備更有利的競爭優勢。例如，台灣的工廠老闆，喜歡菲律賓勞工更勝於泰國勞工，因為前者可以閱讀重要機具跟設備上的英文指南。菲律賓樂手廣泛地受雇於亞洲主要城市的四、五星級飯店駐唱，因為他們熟悉英文歌，但工資比美國樂手來的低廉許多。

相對起來，台灣並沒有被英語系國家殖民的經驗。雖然長期以來英文是中學教育的基本科目，但大部分的台灣人的口語英文流利度有限，即便大學畢業生也是如此。然而，隨著近幾十年來，台灣發展成出口依賴的經濟，以及跨國資本的流入，英語已經被普遍認可為一項有價值的人力資本。台灣政府最近開始把英文課提前到小學教育，以增進英文教育的品質。總統陳水扁甚至一度建議將英文定為國語之外的第二官方語言。公共輿論也倡議政府放寬白領外國人的雇用規則，以滿足需要更多外國英文老師的需求。

當代的台灣父母熱切地投資金錢在他們小孩的英語資本的培養上。上層階級家庭雇用私人家教來教導小孩英語，準備出國遊學或留學；中產階級父母把小孩從小送去雙語、甚至全美語的幼稚園與安親班，以及暑期的英語營。英文已經變成一個台灣中產階級在全球經濟上，追求向上流動的重要工具，在這樣的脈絡中，雇用一個受過良好教育且說英文的菲律賓女傭是一項一劍兩刃的安排，這可以確認雇主新興達到的成就地位，但也可能挑戰他們的雇主權威。

研究方法

本文的主要田野工作進行於 1998 年 7 月至 1999 年 7 月期間，我在台北的一個隸屬於天主教會的非政府組織擔任志工工作，包括教中文、協助勞工權益諮商。每個星期天，我參與她們的聚會活動，如逛街購物、匯款寄包裹、生日聚餐、

³ 自從1935年菲律賓憲法制定後，後殖民政府推動以他加祿語為國家語言，這是馬尼拉地區居民的主要語言，如今也被稱為Pilipino。直到1970年代，雙語的教育政策才逐漸取代對於過去獨尊英文的情形。

去迪斯可跳舞、唱卡拉OK、在公園野餐，以及在速食店午餐等等。其間我一共對 58 位菲律賓籍的家務移工進行訪談，其中的 17 位只進行過單次的晤談(兩位在菲律賓、五位在雲林某鄉鎮、其他在台北縣市)，與其餘報導人則在一年的田野期間內有定期的見面與聯繫，其中一些在我在田野工作結束後仍透過電話、書信或電子郵件維持聯絡。訪談時間由 30 分鐘到 3 個小時不等，半數以上為全程錄音並逐字謄錄。其餘許多訪談與觀察是配合她們的活動作息，在吵雜及易被打擾的公共空間進行，只以筆記輔助記錄。所有的訪問溝通都是以英語進行，本文引用時則被翻譯成中文。文中所有的名字皆為假名。

此外，我也訪問了來自 45 個家庭的台灣雇主，其中包括 39 個女性，3 位男性，以及三對夫妻。受訪者的來源係透過滾雪球的介紹，但為了避免受訪來源的過度集中而造成樣本上的偏誤，每個受訪者的引介對象僅限於一人。多數受訪家庭分布在北台灣(台北縣市、桃園中壢)，只有四名年長女性(為外籍監護工的照顧對象)住在斗六。為了能夠觀察到他們與家務移工的互動，訪談的地點我盡量約在受訪者的家中，在外全職工作的雇主，則有不少約在工作的地點或是附近。訪談時間從一個到四個小時不等，所有的訪談皆為全程錄音並逐字謄錄。

在家裡「做階級」

六十出頭的王先生，在農村長大，六零年代搬到台北經營批發業，搭上了台灣經濟起飛的列車，王先生的事業成功幫助他取得了不同於父母輩的經濟財富與社會地位。雖然王先生只有高中畢業，他很驕傲地提到他的所有小孩都唸到大學，甚至出國深造。在訪問過程中，他明確地把他的階級地位與雇用外傭連結起來：

你記不記得你一進來的時候講什麼？第一句話就說你們家菲傭長的很漂亮，就是配合我們這個...我們家族，我弟弟、我兒子女兒都是大學畢業，都是比較高學歷的，雖然還不到留學...我要說的是，我們家這個看起來很有氣質，很有身份，有的看起就是...啊，這個查某干啊，一看就是女傭嘛，我們這個不像，所以可以配合我們。

雖然雇用家庭幫傭確實為了滿足勞務上的需求，但在許多台灣家庭裡，同時也是一種證驗雇主財富的「炫耀性消費」(Veblen 1994)。傭人經常被指派進行一

些儀式性的工作，並無實際、必要的功能，旨在彰顯主人生活的奢侈舒適。比方說，受訪移工許多跟我抱怨，即使雇主自己有鑰匙，也一定叫她們來開門；要求傭人接聽電話，即便她們說不了幾句中文。

然而，也不是所有的台灣雇主都喜歡這樣的互動模式。新富雇主不同於老有錢人(the old rich)，後者在長期雇傭人的生命經驗下，已經培養出無意識的階級慣習(habitus)，在語言態度與肢體動作上都自然有著「主子」或「老闆娘」的模樣。新富雇主如文真，是一位近四十歲的大學教授，也是兩個孩子的母親。當她雇用的菲傭以謙卑的言語態度與肢體語言跟她互動時，她不但不習以為常，或享受這樣的身分地位標誌，反而覺得渾身不舒服，造成她心理上的負擔：

我覺得菲傭自己會這樣，我自己不會去要求，這樣有時候很難相處，因為她會好像要來服侍你，比方說有些事我想要自己做，（像什麼？）像把菜從鍋子過到盤子，小事啊，可是她就覺得是她應該做的事情，不讓她做她很不安的樣子。或者是講話上，她都會說我們家很富裕啊，她們家很窮，所以很羨慕我們啊。

像文真這樣的雇主不想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目睹、甚至參與社會不平等的劇碼，而當自己的甜蜜家庭變成別人的冰冷職場時，也感到不自在。因此，他們試著與家務移工建立私人連帶來減輕這樣的不舒服與尷尬（詳見 Lan 2006: Ch.6）。另一個抱持類似態度的雇主是曼君，一位四十初頭、有大專學歷的旅遊仲介，她僱用了一個菲律賓女傭來協助家務，幫忙照顧她九歲和三歲的兩個孩子。在訪談進行當中，她屢次跟我強調自己的中產階級地位，以及隨著歷史與世代的變遷，她作為現代雇主對移工所採取的尊重態度：

現在也不是威權的時代了，像我們這種小康家庭，是因為可以負擔，有這個需要.....我們不會把人家當下人，我們會跟小孩說叫她幫忙做什麼要說謝謝，這個人權是要做到的，因為人家是環境所逼來幫忙，並不表示我們高人一等。但是像我媽媽那個年代的人，就會說你們家可以請菲傭，你們家有傭人，就比較有那個威權的感覺，是主人。

這些雇主的自我陳述與實際上的勞雇互動情形是否存在落差，是我所難以觀察到的，姑且對此不論，重要的是，這些雇主標榜自己對於民主和用人唯才(meritocracy)的信仰，不同於傳統的威權主義和貴族制度，來呈現他們現代化的自我形象。台灣的中產階級被認為是催生 1980 年代政治民主化的關鍵性力量 (蕭新煌 1989)。我在 1998-1999 年訪問的對象，多集中於三十歲到四十五歲的年齡層，這也是官方調查資料中聘僱家務勞工的主要人口來源 (勞委會 1999)，這個世代的人不僅經歷或參與了台灣的經濟奇蹟，也在台灣劇烈變化的政治情勢中，走過他們的年輕歲月。在這樣的政治經濟歷史脈絡中，民主、自由和獨立，構成了台灣中產階級自我認同的核心價值。

Jack 和他的妻子都是四十多歲，在不同的跨國公司擔任經理，他們僱用了兩位外籍監護工來照顧他生病的父親以及他們的小孩。Jack 在訪談中提及他童年時期家裡小康的經濟 (父親是軍人)，相較起來，他不害羞地吹噓他的經濟成就與社會流動。作為第一代的家務雇主，Jack 表達自己對於這樣的家庭生活可能有違他所崇尚的自力更生、獨立的道德原則：

我不會鼓勵[人家請外傭]，如果家裡有需要才去做，不要隨便聘僱外傭，人會變得懶惰，像嗎啡一樣上癮，能自己作自己做，不要依靠別人比較好。其實別人聽到我們家請兩個菲傭，都羨慕得不得了，其實沒有什麼好羨慕的，要請人就表示家裡的 organization 出了問題，如果家裡的 organization 沒有問題，誰又願意請個外人住在家裡呢？

這些雇主使用基於需要的中性論述來描述他們的僱傭決定，同時也試著淡化他們跟家務工之間的地位落差。不論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地，他們以這樣的論述修辭，確認了自己的中產階級認同，並與其他的階級畫清界線。相對於上層階級家庭透過繼承(ascribed)所取得財富與聲望，中產階級雇主強調靠自身的努力所獲致的 (achieved) 社會地位；相對於老有錢人(the old rich)家庭有著聘僱奴僕或傭人的世代傳統，他們強調新富雇主的僱傭關係是以平等為基礎、建立在需求之上的勞務購買關係。

學者論及台灣在 1980 年代後擴張的新中產階級時，將之區分為兩個群體，一是中小企業與商家，二是知識份子與專業(Chu 1996)。前者的資本積累建立在

生意經商，未必需要正式學位的加持，我在本文後會提到，這些雇主由於英文能力較為缺乏，在和大學生菲傭互動時經常遭遇困難。具有高學歷、從事專業工作的雇主，傾向於將自己與低教育程度的雇主區分開來，他們指出高等教育和流利英文建立明確權威和有效管理的必要基礎。比方說，近四十歲的楊經理，把他自己和他叔叔拿來作比較：

像我姨丈在鄉下請一個菲傭，他們都不會講英文，所以也不敢要求她們做什麼，她就整天帶小孩散步就好了，我阿姨反而要煮飯給她吃，幫忙沒幫到，反而要伺候人家，說人家來是客人，不好意思要她做什麼...所以說鄉下人比較不適合，因為沒有辦法溝通，就不能讓她們瞭解她們的身份，不是說虐待啦，不過請來就是當女傭嘛。

根據楊經理所言，「鄉下」的雇主缺乏合宜的語言能力和菲傭溝通、無法「下命令」或有效管理，來建立雇主的權威，結果，女傭沒有待在理應從屬的位置，而成為一個「客人」。另一位經營電腦公司的雇主也有類似的說法：

我們做電腦的人都會講英文嘛，比較負面的人都是水準比較低層次的，抱怨把你冰箱的菜一次煮光光啊...一定是不懂得跟她講嘛！因為英文不會講，就沒有把制度定起來給人家，像我們一來制度都已經定好了，就怎麼可能會出什麼鬼！？所以是雇主的問題。

另一種專業雇主區分他們自己與低教育程度雇主的方法，是把高等教育與普同主義的人權論述連結起來。如以下這些受訪者的話：「我們受過教育的人也不希望對人是上對下，我們都是平起平坐，吃飯也是坐在一起吃。」「我們知識份子，都是很講民主的。」「那些報紙上虐待人的案子，我想他們的雇主都是低教育程度的吧。」也有不少受訪雇主引用自己在國外留學或居住的經驗，來證明自己的英文能力，以及自由開明的態度。

我無意指高教育程度的雇主必然會以較為和善或公平的態度來對待他們的移工，重要的是，他們相信或認為他們正在如此作為。不論有意識或無意識地，他們把勞雇互動的日常關係，連結於中產階級的自我意象與價值展演。當這些中

產階級雇主使用需求、自力更生、自由民主等道德修辭來描述家裡的僱傭關係時，他們所標示的階級界線不在於劃分他們和移工之間的差異——這個界線對他們來說已經非常明顯——而是區分中產階級雇主與「位居其上」（people above）（老有錢人）和「位居其下」（people below）（低教育程度的雇主）的差異。他們不僅參照本地的階級排序來建立他們的中產階級認同，同時，他們也透過跨國的想像連結來認同自己作為全球都會新貴（cosmopolitan urbanities）中的一份子——地球村中共享類似的語言慣行和文化品味的想像共同體。

越國界跨階級

我在先前發表的文章中已經提到，許多在台灣工作的菲律賓家務移工，之前在菲律賓都不曾做過女傭。她們之中有大部分在家鄉擁有大學畢業或肄業的教育，許多人先前從事的是白領工作，特別是護士、老師以及秘書等文書工作。她們的學歷背景與工作資歷明顯高於印尼與越南的移工（藍佩嘉 2002）。這樣的情形之所以形成有供需雙面的原因，一方面，許多台灣雇主喜歡被認為比較「文明」、且能教他們小孩英文的大學畢業生。另一方面，由於台灣付給移工比其他亞洲地主國高的薪水，因此吸引了具備較多經濟資本（仲介費）、人力資本（教育）、與社會資本（推薦與借貸的私人網絡）的申請者（藍佩嘉 2005）。

雖然在海外工作為移工帶來實質的經濟效益，女傭卻是被烙印為低技術與低教育的工作。為了解決這種分歧的地位，菲律賓移工必須隱藏他們之前的背景，並且「表現得像個女傭」（act like a maid），如同一位報導人的描述：

既然你已經到了這裡，你不應該再說你有一輛車、有個女傭在菲律賓。如果你在菲律賓已經什麼都有了，那為什麼你還要來到這裡？把嘴閉上。你已經在這兒了，你需要跟隨這裡的規則。你是一個家務幫傭；你必須做每一件事情。你不能抱怨你不知道怎麼做這個、怎麼做那個。

女傭工作的烙印，跟向下流動的自尊，被在他們地主國中的低社會位置所激化，因為地主國當他們是低等民族。世界體系參差不齊的發展，被轉化為台灣雇主與菲律賓女傭之間互動的不平等。許多菲律賓移工在她們的海外工作經驗中，表達了這類剝奪與羞辱的感受：

Trina: 大部分菲律賓人過去並沒有這樣的經驗。我們在菲律賓並不是女傭，有些人甚至都不做家事的！

Maya: 你知道高雄的那個案件嗎？有個菲律賓人被虐待？她在菲律賓是個老師耶！她的雇主一定以為她很笨…

Trina: 工作困難沒關係，但雇主並不尊重你。

Maya: 他們把我們看的很低。因為我們的國家很貧窮，我們就變的很渺小。

Rhacel Parrenas (2001)對羅馬與洛杉磯的菲籍家務移工研究中，把這種情況叫做「矛盾的階級流動」(contradictory class mobility)。雖然實質的財富收入增加，移工同時也經歷向下流動，因為他們在海外從事的是被社會污名化的職業。這些移工不僅在家鄉與地主國中沿著相反的階級路徑滑動，她們的跨國生活也遭遇了衝突的階級認同。由於他們受過大學教育與先前從事的職業，傾向將自己定義為中產階級，但他們現在卻深陷於社會認為地位低、無技術的工作，並且在遷移的國度中被視為種族他者。

菲律賓家務移工並不是唯一經歷衝突階級認同的移工群體。根據 Romero (1992) 和 Salzinger (1991)的研究，加州的拉丁裔移民家務工作者，許多也在家鄉擁有中產階級職業，但她們靠著建立非正式的契約，確定工作項目，創造了一個接近商業交易的環境，來提升這個「骯髒工作」。然而，這樣的專業化工程並沒有發生在台灣的家務移工身上，主要的原因在於台灣的移工所面對的政策脈絡與工作組織方式大為不同。台灣政府禁止轉換雇主、限制居留期限的規定，局限了短期客工跟雇主談判交涉，以合理化勞動條件的議價能力。此外，離鄉背井的家務勞工跟雇主同住，不但欠缺當地社會網絡，且原子化地分散於個別私人家戶的狀況下，更增加組織工作、培養集體認同的困難。

我在田野過程中，偶有基進左派的勞工團體，在星期天前來教會 NGO 進行勞工教育的工作，許多移工在修女的呼籲下捧場參加。然而，當勞教人士在台上聲嘶力竭地講說著資本主義的國際分工對於海外移工造成的種種剝削時，這些抽象理論與概念卻似乎難以召喚出台下聽眾的認同。有些在桌下傳遞著結交國際筆友聯誼社的傳單(心裡猜想著，跨國婚姻或可終結海外工作的艱困旅程?)，有的擔心著演講拖得太長，會耽誤她們難得放假的時間(心裡計畫著，要趕緊前去台

北火車站匯款給家人)。缺乏建立專業管家或是海外勞工的集體認同，在台灣的菲律賓家務移工發展出較為個人化的策略來解決現實的困境。⁴他們視地主國的工作為暫時過道，引領他們通往向上流動的未來。

許多菲律賓移工透過將他們自己與普遍的「女傭」範疇脫去關聯，來折衷她們所經歷的衝突的階級認同。她們不僅強調自己只是短期在海外落難的女傭，更強調自身與「在她們之下」的菲律賓本地女傭大不相同。事實上，許多本地女傭就是被海外移工雇用來照顧她們在菲律賓的家庭。例如，Christina 擁有大學學歷，之前在菲律賓是個老師，她在台灣工作時，聘用了一個外省移民來照顧她在馬尼拉的小孩。儘管她們從事的是類似的工作，Christina 在自己與女傭之間劃清界線，強調她們在文化資本、乃至於階級屬性上的差異：「我姐嘲笑我說，妳有一個女傭在菲律賓，可是妳自己在台灣就是個女傭！我說這是不一樣的，她們是沒受過教育的，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在國外工作，妳必須非常認真、非常執著。」

菲律賓家務移工也在移工群體內部劃分階層差異，強調自己在人力資本與文化資本上的優勢，特別是流利的英語，以區分出她們相對於其他國籍的家務移工的優越性。菲律賓與印尼，這兩個台灣家務移工的主要族群，在台灣雇主與仲介機構眼中有著特定的刻板印象(Cheng 2006, Lin 1999, Loveband 2004, 藍佩嘉 2005)。菲律賓移工被認為是「聰明但刁鑽」，相對於印尼家務移工的「愚笨但溫馴」。菲律賓家務移工本身也可能延用類似的刻板印象，用道德界線區分出她們與印尼競爭者的不同。透過塑造印尼勞工他群的負面形象，菲律賓勞工建立了對於我群的能力與可靠性。他們形容「那些印尼人」為沒教育、愛調情、缺乏英文技巧、會偷雇主的東西、並且做家務工作的方式過於落後，無法勝任現代家庭的需求 (見 Lan 2006: 90-2)。

請女傭或是請家教？

某個星期日，我跟朋友去爬陽明山，隨後到後山的一家庭園咖啡館聊天。庭院裡有幾個台灣小孩在菲律賓或印尼裸母的陪同下開心地玩耍，他們的父母們則坐在冷氣咖啡廳內享受餐點與飲料。我旁邊的桌子坐著一對夫妻，丈夫看起來三十多歲，妻子膝上坐著不到十歲的小孩。這小孩吵著要去庭院裡玩耍，媽媽則頻

⁴ 然而，有菲籍家務移工在個人的自我陳述中，強調過去的專業背景可以用來經營家務工作，以此對抗女傭工作的污名，見鄭淑如的研究發現(Cheng 2006: 154-9)。

頻叫他不要吵，等爸爸喝完咖啡再說。我側聽到這對夫妻的對話，將之草草記錄在我的餐巾紙上：

先生：你看，攏是外勞在哪裡顧囡仔。

太太：我也在想我們可以請個菲傭，這樣小孩可以講英文。

先生：人家是有錢的，才在那裡請。

太太：（不悅的語氣）才一萬多塊嘛，又不是請不起。

先生：（低聲喃喃）一萬五.....可是喔（語氣堅定）人家說菲傭帶的小孩會白痴，香港的小孩現在就是這樣，很白痴，很依賴性。

太太：她們帶小孩主要是顧小孩，注意安全什麼的，而且請來可以幫我做家事，這樣我星期六就可以去學英文，我就可以有時間去做其他的事啊。

先生：哎呀，再說啦。

這對夫妻的對話，如同我訪問過的許多台灣家庭一樣，透露出請外傭的決定往往折射出夫妻間有關家務分工的性別戰爭，太太往往積極爭取市場外包以卸除自己肩上的父權家務負擔(藍佩嘉 2004)。而這段對話讓我最感興趣的是，這位妻子透過怎樣的論述來合理化雇用菲律賓女傭的必要性。首先，她強調可以教孩子英文的額外優點，此舉能增加下一代的向上流動機會。其二，請菲傭可以減輕她的家務，好讓她有時間去上英文課，為自己這一代投資人力資本與文化資本。

在台灣，具備流利英文能力的菲律賓勞工，經常會被指派超過「女傭」範圍的工作責任。Claudia 在菲律賓取得藥學系的大學學位，她的台灣雇主有時派她去一家會員多為上層階級的私人俱樂部中接聽電話。Claudia 非常驕傲的告訴我：

我的雇主之前是一個女性俱樂部的副主席。她總是帶我去她們的聚會。

為什麼？妳需要服務她們嗎？

不，她只叫我接聽電話，並且告訴我打給這人打給那人。這俱樂部有很多美國人。

喔，她要妳說英文！

對啊，就是這樣。她們比我有錢，但是我的英文比她們好 [得意微笑]。

家教是另一項在台灣的菲律賓家務移工時常被指派的仰賴英文進行的工作。當我在教會 NGO 教中文時，有幾位菲律賓移工跟我抱怨她們在工作時沒有練習中文的機會，因為：「我們的雇主喜歡跟我們講英文。」「他們想要練習英文！」許多雇主要求她們教導小孩英文，如 Olivia 與 Imelda 的經驗：

我的老闆告訴我：當他們看到我的履歷表時，女雇主並不喜歡我。她說我在照片裡看起來很醜。但我的男雇主說：「她是一個大學畢業生，而且她是英文系畢業的！也許她能夠教我們英文！」

他們雇用我因為他們想要學英文。就像我老闆的小孩，他們去上美國學校。他們不跟我講中文，因為他們想要練習英文。我知道如果他們雇用一個英文家教，很貴。但是他們可以用便宜的價錢雇用我們做所有事！

Josie 是一位菲律賓的大學畢業生，之前在關島當了幾年英語教師。當她來到台灣的中部小鎮的一個家庭幫傭，她也同時在雇主開的安親班教英文。Josie 謹慎地告訴我，不管有朋友打電話去學校或去拜訪她的時候，都不能透漏她的國籍。她的雇主不想要學生及家長們知道 Josie 是菲律賓人——她被介紹為來自關島的移工。在這個例子裡，Josie 有領到教英文的額外薪水(仍舊比雇用一個以英文為母語的外籍老師低許多)。在其他諸多個案裡，菲律賓人幾乎很少因為他們的英文家教而多收到薪水，而只是被賦予更多的工作跟剝削。

雖然菲傭可以提供兼任英文家教的額外好處，幾位受訪的台灣雇主也指出在跟菲傭用英文溝通時容易遭遇困難。這些抱怨特別容易出現在高中畢業或教育程度更低的雇主身上。例如，高中畢業的芳萍是一家鞋店的老闆。雖然她試著「趕上時代潮流」(用她自己的說法)，在四十多歲的年紀還去報名英文班，她依然覺得跟菲傭溝通的時候充滿挫折，這種情況時常阻礙她行使雇主權威：

我請她，我也[藉此]學一點英文啦，增加講英文的機會... [可是] 有時候很想罵她，可是又罵不出來，更氣，有一次沒幫我小孩洗澡，我氣死了，還要等到去上英文課才問老師這要怎麼講。

另一個例子是國中畢業、經營電器用品店的淑惠，她跟我抱怨用英文來要求

菲籍移工時面臨許多障礙：

本地的一你要求她們，她們不見得聽你的。外勞呢——你要求她們，她們不見得了解。她會問你：「Ma'am，你說什麼？」她很困惑，然後你也變得很困惑 [笑]。每天你都在煩惱說到底要怎麼[用英文]講，有時候我就想，算了，我乾脆自己做比較快。

這些英文能力有限的雇主，必須依賴第三者的幫忙來跟菲勞溝通，如仲介、成年子女、或是年紀小但有上英文課的小孩。也有些仰賴電子字典的中介，雇主把想說的中文打進去，讓字典翻成英文給菲勞看。當我問 Judy，她的經營小型成衣廠的雇主能否說英文，她回答：

沒有，只有那個年輕的孫女。她在加拿大唸書。但她現在不在台北。如果我有問題，我會寫在信紙上，我的雇主會把信紙帶去工廠。秘書會講一點英文，這[程序]很複雜。有時候我想要抱怨一些事情，他們只會說：I am sorry. I don't understand (對不起，我聽不懂)。

語言障礙使得 Judy 很難和雇主協商工作的內容與條件。然而，也有些菲律賓家務移工視這樣的溝通障礙為優點，因為在這樣的情況的，雇主就無法對她們施行許多工作要求。如一位菲籍移工所說：「妳的雇主不懂英文反而好啊，這樣她們就不能要求妳做很多工作。」也有菲律賓勞工會更積極地透過操弄英文來反抗雇主的要求。例如，Mercy 曾在新加坡工作五年，然後才來到台灣，在一個開小型工廠的家庭裡工作：

上次我的雇主叫我清理工廠辦公室，我說：「What?」然後我就繼續拖地，假裝沒有聽到。然後他就沒有再說什麼了。因為他不太會說英文！

但在新加坡妳就不能這樣啊，因為那邊的雇主說英文？

我還是可以啊 [很神秘地微笑]。我就假裝聽不懂英文嘛！

對英文家教的要求通常出現在擁有較少語言資本的雇主。相對的，受過高等教育的雇主介意擔心他們的小孩從菲傭那邊學到「壞的」、「不標準的」、「粗俗的」英文口音。有些雇主因此送小孩去上美國、英國、或澳洲老師授課的英文課，以改正小孩從菲傭那邊學到的負面示範。有牙牙學語小孩的父母也可能介意他們的小孩會不知不覺把他加祿語或其他外傭說的方言，當成自己的母語。開電器用品店的淑惠，當我問她是否期待菲傭教小孩英文時，這樣回答：

不用！因為我要的不是菲律賓腔的英文。你不覺得嗎？有一次我在跟我們菲傭講話，一個客人聽到就說啊你會講菲律賓話，我聽到我想完了，我的英文被聽成菲律賓話，那是不是我被她們同化了？不行不行，我的小孩一定不能跟她們學英文，會有那種腔調。

另外一個擁有博士學位的雇主美瑩，因為擔心菲傭對於小孩語言學習的影響，而實行非常嚴格的溝通規定：

我規定他們要跟菲傭講中文，菲傭跟他們講英文，因為一開始我就顧慮到菲傭的英文發音不好，國語又不標準，他們剛開始是雞同鴨講啦，可是過一陣子就可以混的很好。而且我跟我先生晚上都在家，所以我很慶幸小孩子的發音沒有受到影響。而且我嚴禁菲傭跟小孩子說土話，我見過有的這樣，我說我不希望小孩子將來講土話。現在小孩大了會講一點英文單字。

有些雇主反對菲傭擔任英文家教，因為他們相信這個安排會導致「角色混淆」：家教/指導者涉及一定程度的權威與優越，與「女傭」角色的卑屈、低劣位置相互矛盾。Evita 告訴我她之前在新加坡幫傭的經驗，很清楚的揭露了同時進行英文家教與女傭工作的關係緊張：

我和女老闆起衝突。她要我教小孩英文，我說 OK，然後我就要小孩學，但是他不肯。他還用髒話罵我，比如說「You bloody Evita, you shit! (妳這個該死的 Evita，妳狗屎！)」我很生氣。我的兒子跟他一樣大，但絕不會對我說

這樣的話！所以我就打了他一巴掌。我跟我的雇主說：「這不是我的錯。」但她要解雇我，我說：「算了，我走。」

在某些方面，雇用有大學教育的菲傭的確使雇主受惠。這種安排可帶來教小孩英文的額外好處，並增加了僱用外籍女傭作為一種炫耀性消費的光采。然而，「女傭」與「家教」的混合有著基本的矛盾。高教育女傭甚至可能把他們的語言能力轉換為反抗的資源與策略，來挑戰學歷較低或無法說流利英文的台灣雇主的優勢與權威。

後台的八卦與笑話

某個星期日，幾位菲勞與我在大安公園野餐，Grace 跟 Carlita 慵懶地坐在草地上閒聊，比較她們跟現在台灣雇主與之前新加坡雇主用英文溝通的情況：

Grace：我覺得在這裡[台灣]說英文比較自在。

Carlita：在新加坡，他們會糾正我們的英文，因為他們學的是英式英文，我們學的是美式英文，跟這裡比較像。在新加坡，他們不說”vase”跟”God”[用美國腔]。他們說”vahse”跟”Gohd”[用誇張的英國腔]。

PCL：他們認為妳的英語是錯誤的？

Carlita：是啊，他們認為我們是錯誤的，而且我們應該用他們的方式說。

PCL：所以當妳說，妳覺得在這裡說英文比較自在，是因為這裡的英文跟妳說的比較像，還是因為這裡的人英文說的比妳爛？

Grace：當然是第二個原因囉 [笑]。

Carlita：我的雇主說：「啊，妳的英文說的很好」。我心裡想「才不咧，我的英文不怎麼樣。」他們要我說慢一點，但我覺得我已經說的很慢了！

Grace：我雇主的朋友也對她說，「啊，有個人免費教妳英文真好！」

幾個主要的亞洲地主國，包括香港、馬來西亞、與新加坡，都曾是大英國協的一部分。即便在後殖民時代，英式英文於這些社會仍有強大的影響力。1965年獨立成國的新加坡，由於政治精英多有留英背景，加上避免國內種族衝突的考量，教育上推動雙語政策，尊英文為共通語言，視華語、馬來語、淡米爾語為地

方語言，直到 1979 年後才開始推動「講華語運動」(洪鑣德 2002)。在獨立後成長的新加坡人，特別是中產階級，不論在正式場合與家庭生活中都普遍使用英文，或是混雜一些馬來話、福建話與廣東話字彙的新加坡式英文(Singlish)。在香港，雖然大部分的香港人說廣東話，但在 1997 年回歸中國之前，英文是官方語言，也是各級教育使用的主要語言(Crystal 1997)。

如同上面的對話顯現的，新加坡雇主對於什麼是「正確」腔調或「標準」英文抱著既定看法，就是英國腔。這樣的看法反映出殖民地語言慣習(linguistic habitus)的內化，即使他們說的其實是承襲英國腔調的新加坡式英文。然而透過這個方式，新加坡雇主建立了他們的權威，堅持他們語言展演的優越與正當性，遠勝過於菲律賓人的「錯誤發音」〈帶菲律賓腔的美語〉。

在台灣，英文並非通用的語言，這樣的情形使得這項語言資本的價值相對增值，並且擴大了跨國家務僱傭關係中環繞著英文所進行的象徵鬥爭的灰色地帶。有些菲傭藉由他們的英文能力取得相對於台灣雇主的文化優越感，他們認為英文更有經濟價值、更受文化認可。而當他們接受了這個全球語言的象徵霸權的同時，他們也會貶低其他語言，如同他們的雇主貶低菲律賓方言一樣。我在教會教的中文課裡包含了台語的一些基本字彙，以便利她們照顧老人與日常生活中的方言使用。有些菲律賓學員抱怨台語很難學。Helen 更直率的說：

我不明白—爲什麼這裡的人不說英文？那些百貨公司的小姐長得又漂亮穿得又時髦，但她們一點英文都不會說！我不知道她們在學校學些什麼？她們浪費她們的時間，然後現在我們要浪費我們的時間來學這個蠢語言！

另外一位菲律賓大學畢業生，Suzanna，在斗六小鎮的台灣家庭工作。訪問時，她對學台語表達了類似的抱怨：

他們要我教他們的小孩英文，但我必須先學台語。他們說如果我不學台語，我仍然是個笨蛋，即使是個大學畢業生…你不要跟他們說喔—其實他們才是笨蛋！英文在這裡沒什麼用。也許我應該去加拿大，我不想學台語，太難了。

我們的訪問發生在 Suzanna 位於雇主家裡的房間。她謹慎地降低了音量，並要求我不能把她講的話對她的雇主說。雖然她很不情願要去學台語，在雇主面前，也就是高夫曼(Goffman 1959)所講的「前台」，她仍然必須表現順從的樣子。只有在周日放假出門時，可以在雇主管轄外的領域展示「後台」的自我認同(藍佩嘉 2002)。八卦便是家務移工在後台的一項常見活動。Rina Cohen (1991: 204) 指出集體八卦與玩笑在這樣的脈絡中所具有的潛在政治意涵：

笑話跟笑聲對個人而言不只是紓解緊張的機制，也是允許參與者重新詮釋經驗、分享彼此確認(reassuring)的溝通、並且提供凝聚力和 support，把個人經驗轉化為集體經驗。

當週日跟朋友聊天時，菲傭們交換著她們雇主的糗事跟家庭秘密，並且批評雇主糟糕的品味與生活習慣，藉此建立自身或我群在文化秉性或生活風格上的優越性，翻轉相對於雇主的階級排序。例如，有位菲律賓移工某次問我，「Fried rice: 你們說炒飯，對吧？」我點頭，她隨即驕傲的跟她的同胞宣布：「我們菲律賓人吃炒飯當早餐，但我的雇主吃炒飯當晚餐。他們不是說我們菲律賓很窮嗎？可是我們吃的是真正的晚餐，不是炒飯！哼，台灣人還覺得他們是什麼社會名流 (socialites)？」在另外一次的菲勞聚會裡，Judy 談論她的雇主：「台灣男人不好，有些很噁心，我的老闆吃檳榔，他總是把檳榔汁吐在地上！」她模仿他吐的樣子，大家都笑了。

更常見的是，菲傭經常揶揄台灣雇主的爛英文跟口音，以此象徵性地反抗台灣雇主的權威，如以下幾個例子：

有一天他們[雇主]出去要我自己看家。他們從外面打電話給我：「Jamie, you go sleep first. Don't wait for us. We will come home eleven YEARS [eleven o'clock] (妳先去睡，不用等我們，我們會在 11 年後 [意指 11 點] 回家)。」我緊張在電話裡大叫：「Eleven years? But I'm here only for three years! (十一年？但我的契約只有三年耶！)」

我的雇主從辦公室打電話給我說：「Luisa, twelve hours, don't forget to *eat* my children! (Luisa, 12 個小時了，別忘了吃我的小孩!)」她實際上的意思是說「Luisa, twelve o'clock, don't forget to *feed* my children! (十二點了，別忘了餵我的小孩!)」[笑]

我的天啊，你有糾正她嗎？

沒，我的雇主不喜歡被糾正。所以我只回答：「別擔心！我已經吃了你的小孩了！」

這些笑話蘊涵了關於工作內容、勞動條件及勞雇互動等豐富訊息。當菲律賓移工與同伴分享這些笑話時，她們從勞動者的觀點重新詮釋了工作經驗，並呈現了一個大不同於雇主指派的工作腳本的對抗論述甚至行動。許多移工嘲笑雇主下達指令的方式，例如，「divorce [divide] the chicken and pry [fry] it when oil is dancing [boiling] (當油跳舞[滾]的時候，把雞肉離婚[分開]並打聽[炸]它)」。另一個常見的話題是當雇主無法使用正確的英文來下指令時造成的誤解。例如，一個雇主要求她的女傭去「丟(throw)信」(意指拿信去郵筒寄)，而該女傭非常盡職地把信都丟到垃圾桶去。

某種程度上，如同 Nicole Constable (1997:176)所言，「這些笑話可以暫時的翻轉雇主與勞工、或本地華人與海外移工的支配與從屬模式」。然而，交換笑話與笑聲的行為仍多隱藏在移工週日的後台活動中。在前台，她們仍必須表演謙卑與遵從工作紀律，謹慎地抑制或掩飾她們對雇主的挑戰與反抗。

語言中介的反抗與支配

有些台灣雇主不喜歡雇用大學生菲傭，因為這些菲傭「太聰明，太有自己的意見」而且「不像女傭」。玉美，一個三十五歲左右、有大學學歷的公務員，對我坦承自己有時候覺得被她的大學生菲傭的氣勢所「壓過去」：

她自己會覺得她程度蠻好的，所以很喜歡跟你講話，可是她們腔調實在蠻重的，又喜歡用一些艱澀的字，坦白說，我常常聽不懂她在講什麼。

當菲籍家務移工把英文操弄為象徵反抗的工具時，她們的策略可能是有技巧

地、不露痕跡地使用艱深的字彙，或是直言不彙地糾正雇主的文法或發音。例如，楊先生，一位大學畢業的業務主管，表示偏好雇用低教育的外傭，因為過去曾受過一位在菲律賓銀行工作過、英文流利的菲傭的氣：

有時候我們英文發音不一樣，她就會說我錯了，我說你不要以為你的發音就對我的就錯（楊太太：常常因為這樣爭執）。她會想要教我、糾正我，我剛開始以為我的英文真的有問題，後來就去問我同事，ㄟ，沒錯啊。我覺得她自己是拉不下身段，她不想待在菲律賓，可是來台灣又不覺得自己是女傭，不希望我們把她當女傭看

像楊先生的移工這樣公然對抗雇主的例子並不多見，大部分的菲籍家務移工都意識到她們的雇主可能會覺得不自在或被冒犯，當他們的英文發音或文法被女傭糾正的時候。Norma 回憶她跟雇主的一段對話：

有次我們在晚餐時聊天，我的雇主說：「when I am a children...(現在式)」我覺得她說錯了，就糾正她：「when I was a child (過去式)。」她重覆一遍我說的，但我從她的語調裡可以聽出來她不太高興。她被冒犯了。所以那次以後，我就不再這樣做了，除非她們問我，不然我不會去糾正他們的[英文]錯誤。就像昨天晚上，男主人跟我說「four units of noodle (四單位的麵條)」，他指的是四包速食麵，我強忍著不要在他面前笑出來！

菲籍家務移工嘲笑雇主破英文的笑話，只能在移工之間流傳。在工作時，她們有意識地避免糾正雇主的英語錯誤；他們迴避直接對抗雇主的權威，為的是防止雇主終止他們的工作契約。例如，Vanessa 跟我說明「千萬別跟雇主爭辯」的策略的重要性，對比於另一個大嘴巴卻被雇主解約的菲傭，Carina：

妳記得 Carina 嗎？她喜歡跟她的雇主爭辯。她糾正她雇主的英文。我跟她說，不論他們說什麼，妳接受就是了！不要糾正他們！他們說，妳「丟下」湯，他們指的是「把湯放下」。Carina 跟他們說，「太太，不對喔。」這就是為什麼她們不喜歡她！千萬不要跟你的雇主爭辯！他們不喜歡妳處於

比較高的地位。我知道很多事，這些但我從來不在雇主面前顯露出來。我只鞠躬和點頭，說 Yes 跟 No。

近十年間，菲籍家務移工在台灣所有家務移工的比例有明顯的降低，從 1998 年的 83% 減少到 2002 年最低的 18%，然而，她們也沒有被其他國家的移工完全取代，仍在市場佔有一定比例，2007 年 9 月的數字為 16%。相較起來，印尼家務移工的比例從 1998 年的 15% 上升到 2001 年最高的 70%，雖然因為一度凍結，以及越南外勞的引進，印勞的佔有率略微降低，最新統計中，印尼佔 60%，越南佔 23% (藍佩嘉 2005，勞委會 2007)。⁵ 替換菲勞的現象，在雇用監護工的台灣雇主裡更為明顯。而在雇用照顧小孩方面，許多雇主仍偏好菲籍移工。在官方的家務幫傭統計數字中 (以監護工為名，幫傭為實的個案則不得而知)，菲律賓的比例提高到 44% (勞委會 2007)。這樣的情況驗證了本文的論點，菲籍移工被認為是較為合適的保母，也能順便教雇主的小孩英文；但對於英文不流利、老一輩的雇主來說，這卻增加溝通或管理上的困難。相對而言，印尼與越南移工沒有選擇，一定要學國語或台語，才能和台灣雇主溝通。再次地，語言變成了象徵支配的工具，鞏固了雇主的權威與印傭的沉默。

結論

本文探討台灣的新富雇主如何看待以及實踐作為雇主的地位與認同，展現出當代台灣中產階級形構的一個側面。我們也看到受過大學教育、向下流動的菲律賓家務移工，將自己與菲律賓的本地傭人以及不說英文的其他國家移工區分開來，無形中阻礙了家務勞工或是海外勞工的集體意識與結盟行動的發展。在進口購買與出口提供家務服務的過程中，台灣雇主與菲律賓移工都在積累與轉換多種資本，透過跨國連帶來提升他們的在地地位。雙方都被全球現代性(global modernity)的想像所召喚，希冀成為國際化與現代的主體(cosmopolitan and modern subjects)，而英文作為一種全球語言，正體現了這樣的想像。

英語能力不只是協助個人在全球經濟中取得工作機會與競爭優勢的人力資本，在國際化的語言場域下，它更是一個文化資本，特定語言、甚至特定腔調被賦予較高的象徵價值與優勢評價。在跨國的家務雇傭關係裡，語言經常變成勞雇

⁵類似的國籍分布轉變也發生在香港與新加坡 (Ogaya 2003)。

雙方在日常互動中畫分階級界線，行使象徵支配與反抗的重要媒介。一方面，台灣與新加坡的專業雇主憑藉他們的殖民連帶或國際經驗，奠定他們的英文技巧的正當性，凌駕於菲傭的「第三世界」英文。另一方面，菲籍移工操弄殖民者的語言工具，在不危及他們工作的前提下削弱或挑戰台灣雇主的權威。她們的語言能力可以幫助她們協商工作內容，或是減少工作量；也增加她們跟雇主溝通時的籌碼，例如刻意使用較艱深的辭彙，或是糾正雇主的文法或發音錯誤。

然而，我也要強調，菲籍家務移工擁有的語言資本可發揮的作用是有限的且相對的。他們的英語發音與流利程度跟英國、北美、紐澳人士的英語比起來，被認為是「次級」且「不正統」。她們或可在台灣雇主面前操弄殖民者的語言工具，卻被排除在語言正當性的系譜之外。高教育的菲籍家務移工相較於他們的印尼籍競爭者，也許會得到一些從英文能力轉換過來的利益跟優勢，但這也可能增加她們的工作量，並且換來「不像女傭」的批評，甚至因此在市場上被較為順服的他國競爭者所取代。畢竟，雇傭關係這個社會空間中的權力最終還是由經濟資本所決定。面對契約終止或是被替換等潛藏後果，她們環繞著英語的象徵反抗仍多藏在後台中。

參考書目

- Basch, Linda, Nina G. Schiller and Cristina S. Blanc 1994. *Nations Unbound: Transnational Projects, Postcolonial Predictions, and Deterritorialized Nation-States*. Langhorne, Pennsylvania: Gordon and Breach.
- Bourdieu, Pierre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Education*. J. Richardson, ed.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pp. 241-258.
- 1987. "What Makes a Social Class? O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istence of Groups."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32: 1-18.
-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esnahan, Mary 1979. "English in the Philippin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9: 64-71.
- Cheng, Shu-Ju Ada. 2006. 2006. *Serving the Household and the Nation: Filipina Domestic Workers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Taiwan*. Lanham, MD: Lexington.
- Chin, Christine. 1998. *Service and Servitude: Foreign Female Domestic Workers and Malaysian "Modernity Pro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hu, Jou-Jo. 1996. "Taiwan: A Fragmented 'Middle' Class in the Making." In *The New Rich in Asia: Mobile Phones, McDonalds, and Middle-Class Revolution*, ed. Richard Robinson and David S. G. Goodman, 207–22. London: Routledge.
- Cohen, Rina. 1991. "Women of Color in White Households: Coping Strategies of Live-in Domestic Workers." *Qualitative Sociology* 14: 197-215.
- Constable, Nicole 1997. *Maid to Order in Hong-Kong: Stories of Filipina Worke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Crystal, David. 1997.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ngland, Kim and Bernadette Stiell 1997. "They Think You're as Stupid as Your English is: Constructing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in Toronto."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9: 195-215.

- Goffman, Erving.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Doubleday: Anchor Books.
- Hall, John. 1992. "The Capital(s) of Cultures: A Nonholistic Approach to Status, Situations, Class, Gender, and Ethnicity." In *Cultivating Differences: Symbolic Boundaries and the Making of Inequalities*. M. Lamont and M. Fournier,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1-20.
- Hanser, Amy. 2005. "Counter Strategies: Service Work and the Production of Distinction in Urban China."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Lamont, Michele. 1992. *Money, Morals and Manners: The Culture of the French and the American Upper-Middle Cla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2000. *The Dignity of Working Men: Morality and the Boundaries of Race, Class and Immigr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an, Pei-Chia. 2006. *Global Cinderellas: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and Newly Rich Employers in Taiwa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Lin, Jean Chin-Ju. 1999. *Filipina Domestic Workers in Taiwan: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Personal Resistance*. Taipei: Taiwan Grassroots Women Workers' Centre.
- Loveband, Anne. 2004. "Positioning the Product: Indonesian Migrant Women Workers in Contemporary Taiwa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34(3): 336-49.
- Ogaya, Chiho. 2003. "Feminization and Empowerment: Organizational Activities of Filipino Women Workers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Pp. 67-89 in *Filipino Diaspora: Demography, Social Networks, Empowerment and Culture*, edited by Mamoru Tsuda. Quezon City: Philippine Social Science Council and UNESCO.
- Ong, Aihwa. 1999.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Parrenas, Rhacel Salazar. 2001. *Servants of Globalization: Women, Migration, Domestic Work*.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bison, Richard and David G. Goodman eds. 1996. *The New Rich in Asia: Mobile Phone, McDonalds and Middle-Class Revolu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Romero, Mary. 1992. *Maid in the U.S.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Salzinger, Leslie 1991. "A Maid by Any Other Name: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rty Work" by Central American Immigrants." In *Ethnography Unbound: Power and Resistance in Modern Metropolis*. Michael Burawoy, 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139-160.
- Sibayan, Bonifacio 1991. "The Intellectualization of Filipin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88: 69-82.
- Veblen, Theodor 1994[1912]. *The Theory of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 New York, B.W. Huebsch.
- 勞委會，1999，<<民國 87 年度外籍勞工管理及雇用狀況調查報告>>，台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 ，2007，<外勞人數按國籍及開放項目分>，職業訓練局統計資料庫，<http://stat.evta.gov.tw/statis/stmain.jsp?sys=100&kind=10&type=1&funid=qrymenu2&cparm1=q14&rdm=HbFgAjgz>，11/12/2007。
- 藍佩嘉，2002，<穿越國界的生命地圖：菲籍家務移工的流動與認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48 期，頁 11-59。
- ，2004，<女人何苦為難女人？雇用家務移工的三角關係>，<<台灣社會學>>，第八期，頁 43-97。
- ，2005，<階層化的他者：家務移工的招募、訓練與種族化>，<<台灣社會學刊>> 第 34 期，頁 1-65。

洪鎌德，2002，〈新加坡的語言政策〉。施正鋒主編，〈〈各國語言政策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蕭新煌編，1989，〈〈變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台北：巨流圖書。